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著作

吴越和百越地区 周代青铜器研究

郑小炉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

郑小炉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两周时期,我国的东南和华南地区是越族的主要分布区域,本书首先详细分析了这一时期该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概况,判断其具体年代,进而探讨了南方青铜器断代的方法。随后,通过对典型越式铜器的类型学研究,揭示其发展演变规律。再通过对文化因素的分析,解析了本地区周代青铜器的构成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南方青铜文化的分期和分区研究成果,将整个越族地区的青铜器分为两个大区九个小区,并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了各区青铜文化的族属。本书还追溯了周代越族铜器的渊源及流向,讨论了周代越族的矿冶和铜器铸造技术、这一地区出土的周代铜器铭文情况、浙江地区的仿铜原始瓷器、陶器及苏北淮阴高庄大墓的年代和族属,同时,通过对两广地区部分典型墓葬和墓地的详细分析,探索了两广地区铜器的来源情况,揭示了吴越地区越人向岭南迁徙的过程。通过上述的分析和研究,使读者能较全面地了解周代越族青铜器的面貌。

本书适合于从事历史、考古、文物等研究的学者及相关院校师生阅读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 / 郑小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03-020190-4

I. 吴… II. 郑… III. ①青铜器(考古) - 研究 - 中国 - 吴国(? ~ 前 473) ②青铜器(考古) - 研究 - 中国 - 越国(? ~ 前 306) IV. 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6426 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 责任校对:曾 茹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王 浩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720 × 1000)

200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6 1/4

印数: 1—1 500 字数: 314 000

定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该成果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
——中国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序

1996年,我在《我的学术道路》一文的末尾写道:“回顾自己从学考古到教考古的30多年,想要研究的问题很多,面铺得很大,但在哪个研究方向上都没有深入下去,做出很大的成绩。如果要一言蔽之,只能说都是在探索古代历史真相这个初衷下做的文章吧。自己越做,越觉得这题目至大,除了自己还要做下去,在有生之年还想多教一些年轻人做。”正因为这样,我带的博士生做的论文,往往超出我所从事的研究范围。所以,“与其说是我在教,不如说是为了教而在学。但我想,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大概不这样逼着,也许反而学不了什么了。探求历史真相需要多方面的方法和手段,能多学一点强一点。而且,就认识中国历史特有的规律性现象而言,只求几个点上的真相,既串不成线,也连不成面,就无规律可言。我愿意继续为教而学下去,在不断学习中继续研究下去”。

郑小炉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的。这恰恰是我所知甚少的研究薄弱环节。由于他是一个踏实钻研而颇有内秀的学生,在独立搜集资料和梳理研究史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而且在初稿中提出了不少很可取的新见解,所以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共同研讨的机会。记得我当时是在医大一院住院治疗早搏,见到他的论文初稿,看一部分约谈一次,再由他修改补充,最后定稿并通过答辩。他取得博士学位后,虽然从事的是文物考古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但仍然继续关注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的考古新发现和新的研究进展,不断充实和修正自己的研究成果,今天此书正式出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约我作序,便想就此机会,谈谈我在和郑小炉一起研究这个研究课题时的学习体会。

(1) 关于吴越和百越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李伯谦先生在1978年庐山“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奠定了基础。他那时就提出了七个区的分法,而且主张归纳为吴越文化和百越文化两大片。后来有不少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探讨。郑小炉从周代铜器的角度对文化分区作了进一步讨论,认为李伯谦原分的“宁镇区(包括皖南地区)”中,应该把屯溪地区(包括赣东北地区)独立出来,而原分的“太湖区”(包括浙江),应按杨楠《江南土墩墓研究》的意见,把浙南沿海地区独立出来。并分别论证了这四个小区在青铜器上各自的特点。在岭南地区则增加了广西中西部地区,李伯谦分的“粤东闽南区”则因缺乏青铜器而未加讨论。所以一共分了九个区。除了屯溪地区目前出土的青铜器集中在西周后期到春秋前期,浙南地区目前发现的青铜器集中在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不再分期之外,其余的宁镇地区、太湖杭州湾地区、湖南地区、江西地区、广东和广西东部地区、

广西中西部地区、福建地区等七个区的青铜器都分为二至三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用图表进行了归纳。虽然其中有些具体器物在图表中的位置还可以推敲,但为今后这一地区的新的考古发现的年代和文化性质的判定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也是受益匪浅的。

(2) 吴越和百越地区出土的诸青铜器群,年代下限往往引起很大的争论。例如包含有著名的宜侯簋的丹徒烟墩山 M1,年代就有西周前期和春秋后期这样巨大的差距。有学者认为该墓出土车马器,而《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王寿梦二年(公元前 584 年)申公巫臣才教吴用兵乘车,所以该墓年代不得早于春秋晚期。郑小炉细心分析了吴越地区已出土的全部车马器,指出烟墩山 M1 的车马器和可确知为春秋后期的丹徒北山顶大墓、镇江谏壁王家山墓等出土的车马器在形式上的明显不同,且从形式排比上论证烟墩山 M1 的车马器应该是吴越地区年代最早的车马器。又从中原地区找出和烟墩山 M1 虽不全同但相当接近的车马器,从比较的角度推定烟墩山 M1 的车马器年代可以早到西周晚期。并指出在贵族生活中使用马车与作战使用马车是不同的两回事。对于反驳烟墩山 M1 年代下限非得晚到春秋晚期的观点,这都是颇有说服力的。

又如安徽屯溪诸墓青铜器群的年代下限,也有很大争论。像屯溪 M3 出土两件方座器,有学者指出和春秋晚期楚墓淅川和尚岭 M2 出土的方座器相似,所以把屯溪 M3 定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郑小炉把全部已发表的方座器作了类型学的排序。发现大多数方座器是“盨顶型”的,上部盨顶的高度和下部垂直的座底的高度之比,是时代愈晚比值愈小。反观屯溪 M3 的方座器,上部四面倾斜的器壁均成弧面,是盨顶的变体,可称为“弧面型”。下部也可以分辨出四壁垂直的座底,但其高度很低。也可以归为“弧面型”的和尚岭 M2 方座器,则可以分辨出相当高的底座。这样一分析,屯溪 M3 的年代和尚岭 M2 的年代不仅不会相同,而且应该比和尚岭 M2 的年代要早得多。郑小炉是用屯溪 M3 出土的原始瓷器和洛阳北窑西周墓的原始瓷器相比较,把屯溪 M3 的年代定为西周中期的,从而使该墓出土的方座器成为西周中期该类器的代表。

郑小炉在博士论文中还初步分析过越式簋、越式尊、越式匜等地方型青铜器的演变序列,都使我得到很多新的知识。

(3) 郑小炉在论文中,还细致地分析了各种文化因素的作用问题。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徐舒铜器”影响的分析。他在攻博期间上我的青铜器课和先秦文献导读课时,以作业的方式自选了徐舒铜器的研究题目,并做了徐国史料的汇辑和论文。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发表过《试论青铜甗形盃》(《南方文物》2003 年 3 期)等专门论文,所以在分析吴越和百越地区的周代青铜器时,能把徐舒铜器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提出来分析,不仅对兽面鼎和甗形盃这类徐舒特有的铜器进行了探讨,而且对一般可归为楚式或吴越式铜器的细部上反映出的徐舒式特点,也一一指出,

这也使我学到了新的知识。

(4) 郑小炉在论文中,还通过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结果和相当贫乏的文献比照,力图尽可能确定不同的青铜文化区的族属。例如他提出的皖南区可能就是文献中提到的“干越”,虽然尚不足成为定论,至少提出了可备一说的见解。特别是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文献非常少,因而这一时期的历史也几乎一片空白。我校滕铭予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刘波,在其硕士论文中首先论证了浙江地区的越人文化遗物和两广地区一部分东周后期文化遗物有相似性,提出了浙江地区的越人在东周后期向两广地区迁徙的重要线索。郑小炉在博士论文中又对这种长距离人群迁徙进行了更全面的论证。并在《东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镇”——古越族向岭南迁徙的一个例证》(《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2004年)就一种代表性器物作了深入研究。这种在非开阔草原地带的非游牧人群长距离迁徙的实例,对其他地区的历史研究无疑也是极有启发意义的。

在这篇博士论文经过补充、修改即将正式出版之际,重读了一遍,深愧指导论文时因为身体欠佳,未能细心校阅,恐怕当时就留下一些技术性错误和其他漏洞,现在也未必都已订正。如今和小炉已经天南地北,也失去了再当面切磋的可能,只好请读者恕罪。而且,吴越和百越地区的周代青铜器的综合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回想我在和郑小炉一起讨论时,一是感到有很多问题研究得还很不透,比如所谓“越式鼎”,虽然尽可能分了型分了式,总还觉得尚未完全理清了发展的脉络。又如“交连纹”和“变形夔纹”、“变形兽面纹”如何分别界定,各自的演变系列如何,也觉得还不能说得很清楚。如有时间,很多问题都应该再细细琢磨一番。二是深感有很多地区的资料很缺乏,即使是资料较多的地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资料也并不系统,所以今天可以作出的结论,将来实有被新资料推翻的可能。而新出的资料又会为作出更多结论提供可能性。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只是提供了一个向同行们请教和听取意见的机会,如果还能引起对这方面研究的一点推动,那就真是高兴万分了!

我深望小炉不要放弃这项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对其中一个个可以进一步深入的课题,继续钻研下去。日积月累,必会有更大成就。

林 沅

2007年10月8日

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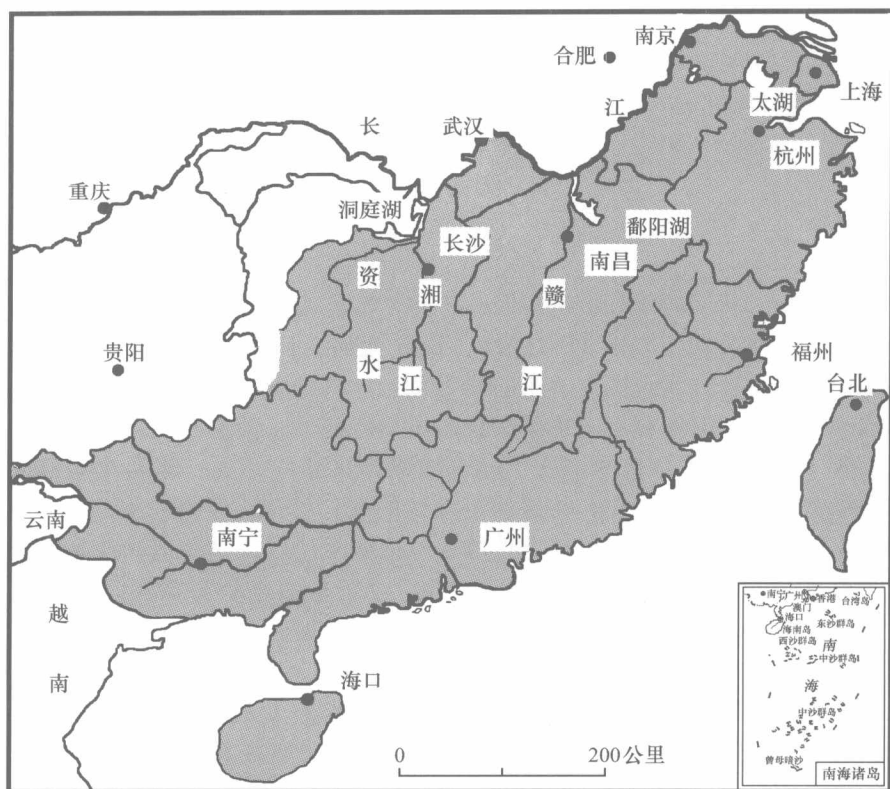
序	林沅(i)
绪论	(1)
第一章 吴越和百越地区出土的周代青铜器及其年代	(15)
第一节 江苏南部地区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15)
第二节 皖南地区(长江以南)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25)
第三节 浙江地区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27)
第四节 江西地区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32)
第五节 福建地区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35)
第六节 湖南地区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37)
第七节 广东地区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43)
第八节 广西地区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51)
第九节 吴越和百越地区以外的有铭文青铜器	(54)
第二章 南方青铜器断代的理论与实例	(81)
第一节 南方青铜器断代理论的探讨	(81)
第二节 若干断代的实例	(83)
第三章 典型越式铜器型式的划分及其分布概况	(92)
第四章 文化因素的分析	(121)
第一节 其他越式铜器及越族铜器纹饰	(121)
第二节 中原型青铜器	(138)
第三节 融合型铜器	(142)
第四节 楚系铜器	(149)
第五节 其他地区因素铜器	(154)
第五章 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的分区与分期及其族属推断	(160)
第一节 青铜器的分区与分期	(160)
第二节 各主要区域铜器之间的联系	(174)
第三节 各区的族属推断	(176)
第六章 越族地区周代铜器的渊源和流向	(183)
第一节 越族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	(183)
第二节 越族铜器渊源与流向	(190)

第七章 周代越族地区铜器与周边地区铜器的相互关系·····	(207)
第八章 其他相关问题研究·····	(220)
第一节 周代越族的矿冶和铜器铸造技术·····	(220)
第二节 周代越族地区出土铜器的铭文·····	(230)
第三节 两广地区铜器的来源和越人的迁徙·····	(231)
第四节 江苏淮阴高庄大墓的族属与年代探讨·····	(237)
第五节 浙江地区的仿铜原始瓷、陶礼器 ·····	(240)
Abstract ·····	(245)
后记·····	(248)

绪 论

一、研究范围

两周时期,我国东南和岭南地区——包括江苏南部、安徽长江以南部分、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北部和湘水、资水流域、广东及广西等地区(图一)是百越民族的主要分布范围^[1],考古学者则以这些地区出土的几何形印纹陶作为新石器晚期到战国时期越族考古学文化的典型特征^[2]。关于其文化的命名,李伯谦在1981年提出,西周以来,在宁镇和太湖地区建立了吴、越两个诸侯国,可以国名来命名其考古学文化,将这两个地区的文化称为“吴越文化”,其他地区至少在东周时期也出现了不少地方性政权,但文献缺载,这些地区该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族名来命名,称为“百越文化”^[3]。杨楠进一步指出,长江以南苏南、皖南、浙江地区及赣东北和闽西北的一小部分地区出土的土墩遗存,为吴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广西中部地区虽然不是几何形印纹陶的主要分布区域,但该地区也是周代越族的分布范围,这一点在学术界多无异议。综上所述,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将我国东南和岭南地区的周代越族青铜文化分为以土墩遗存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区(包括苏南、皖南、浙江、赣东北和闽西北)和没有土墩遗存的百越文化区(包括湖南湘江、资水流域、江西赣鄱地区、两广和福建地区)两大部分。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这两个区域内周代越族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也包括在其他地区发现的有铭文可以明确为吴、越国的青铜器,而在这两个地区晚期时出现的楚文化遗址及其所出土的青铜器则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收录的材料主要为2004年之前公开发表且有明确出土地点、发表有照片或线图或有详细文字描述的我国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铜器(港台地区和越南地区因为资料不便收集不作为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也新收录了2005~2006年发表的上述地区发现的部分重要铜器。此外,主要见于商末~西周早期的铜铙,学者们一般认为是越族的一种特征性器物,而且其发展的脉络比较清晰,流行时间比较集中,为了充分体现这种典型越族铜器发展和演变过程,本书将整个南方地区目前发现的铜铙都予以收录并进行综合研究。而主要见于我国广西、云南和东南亚地区的铜鼓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研究领域,且其年代多较晚,族属上也有较大争议,本书将不再进行专门研究。



图一 中国境内周代吴越和百越主要分布区域图

二、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研究简史

吴越和百越地区虽然同属越族文化区，但以往对这两个地区周代青铜器的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仍是各自独立的，因此，对上述两个地区周代青铜器进行研究的简史也可以分为两大区域来叙述：

1. 吴越地区

吴越地区周代青铜器发现的时间比较早，而且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发现，学者们对这一地区的青铜器研究的较为深入，为便于描述，大致可将之分作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期，年代为 1949 年以前。对吴越青铜器的研究始于青铜器

铭文的研究,这一阶段对该地区青铜器的研究也基本上集中在这一方面。吴越青铜器发现较早,最早可追溯到北宋时期,在王黼等所纂的《宣和博古图录》中即收录有越王者旨于赐钟铭文。清代以后,更多的有铭文吴越铜器被发现,如清乾隆二十六年(1791)在江西临江发现了吴者减钟,同治年间在山西代县蒙王村出土了吴王夫差鉴,道光初年在浙江武康县(今德清县)山中出土13件钩鐙,其中两件为“其次钩鐙”,1788年在江苏常熟翼京门外发现1件“姑冯钩鐙”等。民国时期也有较多的有铭文吴越铜器的发现,如1935年在安徽寿县西门内出土1件“攻敌王夫差剑”;20世纪30年代在安徽寿县出土2件越王者旨于赐剑;1936年在长沙小吴门外楚墓出土1件越王州句剑;据传1940年(或曰1943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1件吴王夫差鉴等。主要见著于王杰等编的《西清续鉴》、邹安的《周金文存》、罗振玉的《贞松堂集古遗文》、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于省吴的《双剑谿古器物图录》、董楚平的《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等书中。这一时期还有个别的专门考释文章,如郭沫若的《吴王寿梦之戈》释“邛王”为吴王,认为此戈即吴王寿梦之戈^[5]。1930年在江苏仪征破山口还发现有一批无铭文青铜器,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一阶段中,没有发现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出土青铜器的遗址。

第二阶段:发展期,年代大致为20世纪50~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在吴越地区进行了较多的考古发掘工作,并且在墓葬、窖藏和居住等遗址中均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丰富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尤其是宜侯矢簋的发现,使吴文化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小高潮。但此时对吴越青铜器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对铭文的考证方面,如唐兰的《矢簋铭文考释》^[6]、陈梦家的《宜侯矢簋和它的意义》^[7]、林沅的《越王者旨于赐考》^[8]等。同一时期,容庚的《鸟书考》^[9]对传世40余件鸟虫书器铭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鸟虫书为吴、越、楚、蔡、宋等国器,其中以越器最多。而对于青铜器本身,除了对照中原地区的标准器进行定年之外,尚无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阶段:繁荣期,年代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在这个时期,吴越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更加广泛,在皖南、苏南、浙江、赣东北等地区都发现有大量青铜器,为这一地区青铜器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条件。学者们摆脱了单纯研究青铜器铭文的束缚,开始注意对青铜器自身特征进行研究。在这一阶段,对吴越地区青铜器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的研究,在分类比较、分期断代、铭文、器物专题和铸造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在分类比较研究上,人们摆脱了以往单纯比照中原地区青铜器的方法。随着青铜器发现的增多,学者们不仅更加注意当地青铜器与中原地区青铜器之间的共同之处,而且越来越关心二者之间的差异。彭适凡《江西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器的分析与分期》一文率先将江西的商~西周青铜器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中原

特征器物；第二类与中原器物特征基本一致，但有一定的地方特色；第三类为土著特色器物。同时，他还东周时期铜器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楚式；第二类为吴越式^[10]。随后，邹厚本^[11]、马承源^[12]、肖梦龙^[13]等学者均依此方法对吴越地区青铜器进行分类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中原型、融合型和土著型的三分法，马承源还进一步将融合型铜器分为仿西周铜器型和基本为土著型，但在器形和纹饰的某些方面采用了西周流行的格式两个小型。

(2) 在断代方法上，主要有两种：一是主要根据其中中原型铜器的年代，来判定共存的融合型和地方型铜器年代，一般还兼及陶器的对比研究。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对江南吴越青铜器断代的三条标准：①参照同时期的中原标准器；②共存伴出的地方陶瓷器；③一些成序列发展的典型器物演化规律^[14]。有的学者则认为，应该以中原地区的铜器断代标尺来判断中原型铜器的年代，以铜器的器物组合和总体风格并结合共出的陶器来判断具有可比性的地方型铜器的年代，并认为那些可能起源于当地的铜器的年代不晚于中原的同类器，而不具有可比性的地方型铜器，只能间接利用中原的铜器断代标准来断定年代^[15]。在这一断代方法中，由于在利用中原型铜器进行对比研究方面的认识存在着差别，对越族地区出土的中原型铜器和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铜器相对年代的判断，还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二者基本同时；其二认为前者滞后于后者；其三认为部分铜器的特征存在着一个先从中原传播到吴越，在当地经过一定的变化后，又反过来影响到中原铜器的过程。二是主要依据融合型铜器中的部分因素与中原铜器和其他区域铜器进行比较，而以其中最晚的年代作为该器的时代。

(3) 分期断代成果。不同的断代方法产生了不同的分期断代结果，彭适凡的《江西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器的分析与分期》一文将江西地区周代铜器分为商末西周、春秋早中期、春秋晚～战国早、战国中晚期四个大的阶段^[16]。而对于以苏南和皖南为中心的典型吴越青铜器的断代研究，则主要存在着两种倾向，第一种是根据其中中原型铜器的年代，将各型铜器的年代上限都定在西周早中期，有的甚至早至商末。如邹厚本《宁镇区出土周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认识》一文在对各类青铜容器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将宁镇地区的周代青铜容器分为三期5段：一期为西周中期到西周末期；二期为春秋时期；三期为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17]。刘兴在《吴文化青铜器初探》一文中将吴文化青铜器分为四期，分别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周昭王以前的西周早期、周穆王至夷王的西周中期、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18]。后来他又在《东南地区青铜器分期》一文中将整个吴越地区（赣东北除外）周代青铜器分作四期，其中，除第一期为商代中晚期外，第二至第五期分别相当于中原的西周穆王之前、西周厉王之前、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春秋中期至春秋战国之际，并分析了各个时期铜器器形和纹饰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19]。肖梦龙在《试论江南吴国青铜器》^[20]和《吴国青铜器研

究》^[21]文中将周代吴国（包括苏南和皖南）青铜器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末至西周前期、西周后期到春秋早期和春秋中晚期，并将约当中原商时期的阶段称作先吴时期，作者还详细分析了各个时期青铜器造型、纹饰特征和铸造技术的发展。而后他在《皖南吴国青铜器分期研究》中，缩小了研究的范围，但在分期结果上与上述二文一致^[22]。刘建国的《论江南周代青铜文化》一文则将江南周代青铜器分为五期：即西周前期、西周后期、春秋前期、春秋后期及战国前期，并分析了各个阶段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文中还将江南吴国青铜文化分为两个大的文化圈：“鼎釜文化圈”和“陶鬲文化圈”，认为前者属于“江南越族青铜文化”，而后者则属于“江南东夷族文化圈”，从而将其中的土著青铜器分为“吴越特色青铜器”和“江淮特色青铜器”两大类^[23]。第二种倾向是将吴越地区土墩墓出土的土著青铜器的年代上限定在春秋中晚期，这一观点以马承源的《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24]，李国梁的《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青铜兵器看屯溪八墓的时代》^[25]，周亚的《吴越地区土墩墓青铜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从安徽屯溪土墩墓部分青铜器谈起》^[26]等文为代表。

（4）铜器铭文研究。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仍然是本阶段吴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不仅发表了大量的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几部综合性的著作，如董楚平的《吴越徐舒金文集释》^[27]，详尽地收录了此前发表的有铭文吴越青铜器及诸家见解，经过比较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曹锦炎《鸟虫书通考》^[28]一书则堪称鸟虫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5）器物专题研究。数量丰富、种类繁多的青铜器的出土，使专门研究各类铜器成为可能。其中，由于在吴越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青铜兵器不仅数量最多，而且是其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学者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吴国青铜兵器初探》^[29]、《吴国青铜兵器研究》^[30]等文对吴国地区各种青铜兵器进行了综合性研究。《试论吴越青铜剑的发展演化和特色》^[31]、《吴干之剑研究》^[32]、《绍兴出土越国青铜剑及其演变》^[33]等文专门对吴越青铜剑进行了类型学和铸造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而《中原地区铜剑渊源试探》一文则将中原地区东周时期铜剑分为四型，并对其起源进行了探讨，认为其中的C型（圆茎中空或半空，窄格，无箍，有首）和D型（实圆茎，宽格，茎上有二到三道箍，有首）铜剑源于吴越文化^[34]。另外，很多学者也对该地区其他有地方特点的铜器进行了研究，如《吴国地区的尊、卣及其他》^[35]、《吴国青铜鼎浅析》^[36]、《吴文化铜甗及其渊源浅谈》^[37]、《对绍兴出土战国权形器的思考》^[38]、《半球形器用途考略》^[39]、《论吴越时期的青铜农具》^[40]等文对青铜容器、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中的部分器类等进行了形制、用途和渊源诸方面的考察，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

(6) 铸造技术和矿冶技术研究。这一时期,吴越青铜兵器上体现的杰出的科技成就,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很多研究单位和个人都先后对其铸造技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菱形暗格纹技术、剑首同心圆制作技术和双色剑制作技术等吴越青铜器铸造技术最突出方面的研究,并获得了可喜成绩,主要成果有《吴越菱形纹饰铜兵器技术初探》、《东周铜兵器菱形纹饰技术研究》、《吴越青铜兵器技术三绝》^[41]、《越王剑的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42]、《吴干之剑研究》^[43]、《吴国暗花纹矛的检测分析与成因探讨》^[44]等。近年来,贾莹等人的《吴国青铜兵器的金相学考察》、《吴国青铜兵器中的铜晶粒及其成因的探讨》分别对吴国青铜戈、剑、矛三种兵器的若干标本进行金相检测,前者探讨其铸造组织、热处理组织和特殊组织,从而分析出吴国青铜器的特色;后者则分析了其中的铜晶粒形态及其成因^[45]。曾琳等的《苏南地区古代青铜器合金成分的测定》一文选取了吴国地区的铜鼎、鬲、戈、矛等80件铜器和7块铜块标本进行了合金成分测试,并分析了其中的铜、铅、锡三种主要成分的组合和变化^[46]。华觉明等的《丹徒母子墩青铜器群铸造工艺考察》、《丹阳司徒西周青铜器群铸造工艺》分别对上述两地的主要青铜器的铸造工艺进行了分析^[47]。此外,《吴越晋人形铜器铸造技术中相关问题的探索》^[48]一文还将吴越地区和晋国地区的人形铜器的铸造技术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认为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越族聚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先秦时期铜矿的主要分布地之一,丰富的考古发现,促进了对这些铜矿的开采和冶铜技术的深入研究。姚方妹的《商周时期古越人的矿冶技术》一文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广西的主要铜矿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这一地区先秦时期的采矿技术、炼铜技术及其重要意义^[49]。刘诗中《中国先秦铜矿》一书对我国先秦时期铜矿和锡、铅矿资源,铜矿的开拓,选矿工艺,冶铜技术,铜矿料的去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50]。裘士京的《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的探索》一书则对江南地区古代铜矿的发现情况及铜采冶、铸造技术和铜材的流动方式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51]。

2. 百越地区

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由于早期发现较少,因而对其进行研究的起步也较晚。解放前,该地区仅发现有个别的周代青铜器,而且基本上是由外国人发现的,如1936年,意大利神甫麦兆良在海丰汕尾、粤东五华、龙川等地发现了少量青铜兵器和工具^[52]。20世纪50年代,在百越地区也仅见有零星的发现,对该地区的青铜器的认识仍然非常模糊,福建和两广地区部分考古工作者将出土铜器的遗址都断在新石器时代晚期。20世纪60~70年代是百越地区青铜器集中发现的时期,许多重要的青铜器和相关遗址都在这个阶段发现,但此时很少见有专门的研究文章,考古工作者们多在发掘简报之后略作推论。在有的地区,如两广地区的学者们甚至对其是否经历过青铜时代和奴隶时代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论。70年代后,

赞成岭南地区曾经有过青铜文化的人越来越多。

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发现青铜器的增多,湖南、两广和福建等地的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本地区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1) 区域性综合研究方面。《湖南古越族青铜器概论》一文重点对湖南古代越族各种青铜器的形制进行了分析,并略论其纹饰和铸造工艺^[53];《论湖南出土的西周铜器》则对湖南西周青铜器的形制、年代和族属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们基本上属于杨越族创造的器物^[54];《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一文对两广地区的先秦时期青铜器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和类型学分析,认为两广地区最早的青铜文化开始于春秋时期,并将广西平乐银山岭、田东锅盖岭和广东肇庆松山北岭三批墓葬的年代定在西汉时期^[55];《湖南两广青铜时代越墓研究》对本地区主要青铜器的形制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认为其中部分器物来源于中原商周文化和吴文化,但不见有明显的楚文化因素,李龙章还认为湖南越文化是两广越文化的源头,两广越文化是湖南越文化的后续和发展^[56];《福建青铜文化初探》一文对福建地区出土的周代青铜器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和类型学分析,认为福建青铜器时代的发生时代最晚当在西周时期,其萌芽阶段可能早到商代晚期^[57];《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一文则将广西地区出土的先秦青铜器分为商至西周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描述,认为各个时期的青铜器来源是不同的,在商和西周时期,主要来源于中原地区,还有部分地方特色器物,而在春秋时期,主要是来自于岭北的楚文化,还有部分自身特征器物,战国时期则可分为岭北楚文化器物、中原文化器物、本地产品和滇文化传统几个部分^[58]。

(2) 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对铜器进行分期断代的尝试主要是在两广地区,广东地区目前主要有两种分期结果:一是分为西周至春秋(又可分为西周至春秋中期和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两个阶段)和战国中晚期两期^[59],或者直接将之分为三期^[60];二是分为西周至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期^[61];广西地区则分为商和西周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三个阶段^[62]。

(3) 对各地青铜器的来源和青铜文化上限的探讨。一般认为,湖南地区商末西周的越族铜器与中原铜器有较多的共同点,约从两周之际开始,具有地方特征的铜器开始增多^[63]。至于两广地区青铜文化的来源,有着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①先秦时期岭南地区没有出现过青铜文化,发现的青铜器墓的年代皆在秦以后,墓主人是秦国的戍军和谪徙民,所出土的铜器是墓主人从秦地带来的^[64];②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是在本地区土著的新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65];③广西的青铜文化是商末西周时在中原的影响下发生的,并且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最深^[66];④两广地区的越族青铜文化来源于湖南越族文化,年代基本在战国到汉初^[67];⑤东周时期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为外来文化,其中的长剑亚群所代表的文化是由吴越地区西迁而来的。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晚期,岭南才

出现青铜文化^[68]；⑥商代后期至西周前期已经出现青铜文化，但其普遍兴起当在东周时期，西周后期在岭北地区兴起的青铜文化有从西部的湘江到桂江和东部沿海从北往南传播两条文化传播通道，向华南地区影响到了岭南地区^[69]。至于福建地区的青铜文化，《福建青铜文化初探》一文认为最晚当出现于西周时期，其萌芽阶段可能早到商代晚期，其早期阶段可能受到浙江和江西商代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70]。

(4) 器物专题研究。大量出土的青铜器，为学者们对各类铜器进行分类研究提供了条件，如《略论岭南青铜甬钟》^[71]、《中国岭南地区出土的早期礼乐青铜器》^[72]、《论中国南方商周时期铜铙的型式、演变与年代》^[73]、《我国南方出土铜铙及甬钟研究》^[74]、《两广先秦青铜容器研究》^[75]、《广西先秦越族青铜兵器研究》^[76]、《广西所见人面弓形格铜剑》^[77]、《再论人面弓形格铜剑》^[78]、《浅谈青铜人首柱形器及其用途》^[79]等文分别对百越地区的青铜乐器、容器、兵器和工具等器物中的部分器类都进行了单项研究。

(5) 铸造技术研究。百越地区青铜器的铸造技术研究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广东省出土青铜器冶铸技术的研究》一文选取了广东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41件铜器，在对其外部特征、铸造技术、合金成分、铸后加工及热处理工艺等都进行了分析研究后，认为广东出土的青铜器可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和中原同类器完全相同；二是明显受楚文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三是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青铜器有一定关系；四为广东本地铸造铜器^[80]。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个别对整个吴越和百越地区出土青铜器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如《古代越族的青铜文化》一文将越族的青铜文化分为两广区、闽台区、太湖区、湘赣区等四个大区，并对其中的越式青铜器进行了类型学和年代学的研究，认为越族青铜文化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先北后南，由北向南传播，传播路线主要有从太湖地区南下浙闽至粤东的东线和由盘龙城过鄱阳湖至吴城，再经江西和湖南的中南部越五岭进入两广的西线^[81]。

(二) 研究现状和本书主要研究目的

1. 研究现状

对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的研究工作，经过各地文物考古工作人员长期的努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各个小区域内的青铜器年代框架基本确立，对吴越和百越地区每个小区域范围内的青铜文化和青铜器，学者们都对其进行了分期研究的尝试，并对分期断代的方法也进行了讨论，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2) 研究方法上愈益趋于科学。开始重视对成组青铜器进行整体研究，注意南方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本地出土青铜器按其所受文化影响